

思想者
THINKERS

说史

李绅“渐次豪奢”

■王厚明



近日，中央领导在新华社报道《网民呼吁遏制餐饮环节“舌尖上的浪费”》上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不由让笔者想起一首家喻户晓的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一般认为作者是曾官居相位的唐代诗人李绅。其实他还有一首诗也颇为感人：“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从这两首《悯农》诗来看，似乎李绅应是个生活非常俭朴的清官，否则怎么能够写出这样的诗句呢？然而事实是，李绅步入仕途飞黄腾达之后，再也没有了悯农之心，逐渐蜕变成一个花天酒地、滥施淫威之人。从唐朝诗人刘禹锡的一首《赠李司空妓》诗中，可以看到一个与写《悯农》时判若两人的李绅。刘禹锡在任苏州刺史期间，应邀参加扬州节度使李绅安排的宴会，他看到李绅家中妓女成群，其中一名歌姬色艺双绝。刘禹锡感慨颇多，写下了《赠李司空妓》：“高髻云鬟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苏州刺史肠。”诗的大意是：你看美酒，轻歌曼舞，司空早习以为常，尊养处优过着奢侈糜烂的生活，可我刘禹锡却肝肠寸断，于心不忍。更有甚者，随着官职升高，李绅“渐次豪奢”，经常一餐耗费多达几百贯，甚至上千贯（当时，1两黄金相当于10贯）。史称李绅爱吃鸡舌，一餐耗费活鸡达300多只，院后宰杀的鸡竟堆积如山。

李绅当淮南节度使时，对百姓疾苦极为漠视，“李绅以旧宰相一方，恣威权”，普通百姓“恨渠不测，渡江者众矣”。就是说在李绅治下的“汗滴禾下土”的百姓，终日惶惶不安，于是纷纷渡江而逃难。与李绅同时一代的韩愈、贾岛、刘禹锡、李贺等人无不对李绅嗤之以鼻。李绅发迹后，还热衷于拉帮结派，攀附权贵，积极参与“牛李党争”，罗织罪名炮制“吴湘案”。李绅死后，被定性为酷吏，受到“削籍三官，子孙不得仕”的处罚。

从李绅的蜕变轨迹中，我们也应有触及心灵深处的自省和警示：无论是工作处事，还是从政为官，地位的变化蕴藏着极大的风险，待遇的趋优潜伏着极大的祸患，权力的升迁面临着极大的考验。

《悯农》是李绅在年轻时发出的感叹，如果他能任官职升迁过程中时时有此肺腑之言，一定不会出现刘禹锡诗中刻画的李绅形象。从悯农之感叹到刘禹锡之感慨，从“粒粒皆辛苦”到食鸡舌宰鸡数百，从忧患“农夫犹饿死”到逼迫“渡江难者众”，李绅逐渐走向“渐次豪奢”的不归之路。

现实中，我们不少位高权重的官员东窗事发后在铁窗下发出的忏悔，也不常能看见李绅“渐次豪奢”的影子吗？权力一旦失察失管，就会成为害群之马。强有力的监督既是对国家和人民负责，也是对官员负责。



无论从反腐的宣示还是从实际的反腐成效来看，新领导层对腐败的“零容忍”姿态给了社会很高期望。确实，反腐到了要和时间赛跑的地步，腐败不反不行，这一点在近日召开的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也得到了体现。

习总书记在会上的讲话，从作风、反腐和权力运行三个角度谈到当前面临的严峻形势，强调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同时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并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工作作风。可以讲，这是一篇反腐美文。

客观地说，执政党不可谓不重视反腐，要论反腐的机构、制度规定及对党员干部的教育，世界上少有国家和政党像这样全

大家

2013年1月28日13时25分，许良英先生在北京海淀医院去世。噩耗传来，我说不出的悲伤。想起18年来与先生交往的许多事情、许多细节，他跟我说过的许多话，泪水再次模糊了双眼。

早在1980年代末，我其实就读过先生发表在《世界经济导报》上的文章《民主是安定团结唯一可靠的保证》，多年后才知是先生之作，原题为《“五四”和中国的民主启蒙——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直到1995年夏天，我才读到先生的大量文章，如《人权概念和现代民主理论》等，这是我真正了解先生的开始。

也是那一年，我在西湖边的三联书店买到先生主持编译的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浅绿色的精装本，正是1960-1970年代的艰辛岁月中，先生在故乡的煤油灯下完成了这个工程。这位年轻时冒着生命危险，一心寻找中共地下党，决心为红色革命献身的共产党人，在1957年却因为反对“反右”运动而成了“右派”，他的言论几次登在《人民日报》显著位置，他选择了自谋出路，回到故乡浙江临海张家渡种田，一去就是整整20年。

我读了《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的大部分和第三卷的全部，爱因斯坦关切社会的那些文字和巨大的人格魅力深深地打动了我——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那时，我读了《爱因斯坦的民主、人权思想对中国的影响》、《中国物理学家的社会责任感》两文，那是包括许先生在内的中国物理学家、科学家群体走过的光荣荆棘路的见证。

就是那一年冬天，我意外地收到先生给我的来信，还有2000元人民币，托他弟弟辗转送来。当时，我妻子住院，信和钱送到医院的病床上。我与先生素昧平生，他只是读到我的一篇不成熟的长文《民主阶段论》，并听说我生活困难，就伸出了援助之手。他信中还说，钱是一位老干部在工资中节约下来的，托他转送给需要的人。这是我完全想不到的。那个冬天很冷，先生的问候和关怀成为永远的温暖。（长期以来像我这样得到过他无私帮助的人有很多，我知道的就有不少。）他在信中对我的有些论述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强调首先把民主的概念搞清楚。从那时起，先生就走进了我的生命中，我们开始了跨越近18个年头的来往。

花25年搞清民主的概念

1996年夏天，我第一次来到北京中关村，敲开了先生的家门。如同早已相熟的老友，我们谈得非常愉快。记得那天他留我吃了中饭，接着聊。他特别推荐我读萨拜因的《政治学导论》、罗素的《西方哲学史》等书。林达的“近距离看美国”系列问世后，他就注意到了，并主动给作者去信。

他真正开始思考民主的问题是1980年代初。1980年为中共中央书记处“科学技术知识讲座”第一讲《科学技术发展的简况》起草的讲稿，率先提出“科学和民主是现代社会的动力”的论断。接着发表论文《试论科学和民主的社会功能》加以较为全面的论证。他说那时他对民主的概念其实也很模糊，多年后自述：“由于我当时对民主的历史和理论所知甚少，附和了国内长期来流行的观点，把卢梭作为近代民主启蒙思想的主要代表。198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系统学习民主的历史和有关的理论著作，方知对现代民主制影响最大的思想家是比卢梭早一个世纪的英国哲学家洛克，而‘人人生而平等’、‘主权在民’等论点在洛克和卢梭以前就有了。事实上，卢梭的思想十分混乱，甚至有不少反民主、反科学、反理性的成分，这些错误思想导致法国大革命时的雅各宾专政和20世纪的极权主义暴政。”

为了搞清楚民主的源流，从1988年前后起，他与夫人王来棣先生合作，决心写一

部《民主论》，因为不久得知胡绩伟先生也要写一部同名的书，他们决定改名为《民主的历史和理论》。25年，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漫长时光里，他把主要精力都放在这个浩大的工程上，他主要负责撰写“民主在西方的历史”部分，从雅典一直写到美国，法国部分还没来得及动笔，他就倒下了。

他说，由于对西方历史不熟悉，每形成一个概念都需要阅读大量历史文献和有关论著，而他的视力只有0.1，加上年纪大了，记忆力衰退，各种干扰又很多，写作断断续续，进展很慢，现在完成的主体部分，大约有19万字。

我有一次和友人去看他，友人告诉他一本荷兰的文献，英文版的，砖头一样的大书，他没有读过，就叮嘱友人帮他复印。我有时候看到一些书，觉得跟他的研究有关，也会推荐给他，他觉得有价值，都会去买。他的严谨、踏实、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在他的这本著作中处处体现出来。特别是他对荷兰共和国和现代民主理论的诞生、英国议会民主的形成和洛克思想的研究，都是见前人所未见，对我们了解民主历史和理论形成的关键环节，具有重要的启发。

经过长期的阅读、研究和思考，他逐步搞清楚了民主的概念。在当代汉语世界，他对民主理解的深刻和表述的清晰、透彻是少见的。他不同意将民主、共和、宪政这些概念并列，他说：“民主概念的内涵实际上已包含了共和（政府首脑由选举产生）和宪政（政府权力受宪法限制），虽然立宪君主制的国家元首（国王）是世袭的，但他并无实际的政治权力，掌握实权的是议会和政府首脑（首相）。因此，立宪君主制与共和只是形式不同，实质是相同的。总之，把民主与共和、宪政并列是不合逻辑的。可以与民主相提并论的是自由、人权、法治、四者紧密联系，互为依存。自由是民主的灵魂和目的，人权是民主的前提，法治是民主的保障。民主、自由、人权、法治这四位一体构成民主政治的大厦。”

1999-2000年间，先生80岁时，他的晚辈要为他编文集，全部文章我校对了几遍，这是我完整地通读先生的文章，包括他1950年代写的。他亲自将文章分成六类：科学史探讨，爱因斯坦研究，哲学思考，为民主、自由、人权呼喊，念师友，忆往事。他将文集取名为《科学民主理性》，这3个关键词，正是他生命最后几十年中念兹在兹的，“五四”倡导的民主与科学正是他一生追求的。早在1988年他有文集要出版，就以此为题，最后书没有印出，拆版了。

说真话

是他一生对自己的要求

从1998年起，他与李慎之保持了5年的通信。他们的价值观有高度共识，对于具体的人、事乃至观点也有不少的分歧，在信中都有讨论，包括对顾准的认识。他们与顾准差不多是同时代人，《顾准文集》自1994年出版以后，曾在中国知识界引起小小的震动，李先生对顾准的思想和人格都极为推崇，许先生虽也“十分敬佩”顾准独立思考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同时却不讳言自己对顾准思想局限的看法。他写给我的第一封信中就指出顾准许多观点是很成问题的。他说，顾准对民主有不少误解，对自由、人权这些基本概念也是隔膜的。

但当他看了胡杰拍摄的纪录片《寻找林昭的靈魂》，却深受感动，对林昭的思想大为认同。2008年是林昭被枪杀40周年，我想编一本纪念文集，给他写信，他第一时间表示支持，并放下手头的工作，很快就完成了一篇很有分量的文章《林昭，中国的布鲁诺永生！——纪念林昭殉难40周年》。他看到林昭自传中提出的“极权”这个说法时，感到十分震惊。因为“极权”或“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这个词他到1980年前后才首次见到，而林昭在1960年就知道了，并

经常使用，这在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中绝无仅有。因此，他认为“林昭可以说是20世纪后半期中国大陆知识分子中政治思想境界最高、战斗力最强的思想者和勇士”。林昭的事迹，使熟悉世界科学史的他联想到公元1600年在罗马鲜花广场被烧死的思想家布鲁诺。他给寄来手稿时，还特意复印了一张布鲁诺的画像。

耿直、无畏，对权势说真话诚然难，更难得的是对身边的人、对所有人都是这样的直言不讳，也因此伤了不少知识界朋友的面子，使很多人对他敬而远之。其实在我看来他一直葆有一颗童心，是一座不设防的城，对人是敞开的，对、对事的评判有无顾忌，完全从本心出发，也不是所有的评判都对，但他是严肃的、真诚的，他活得很真实，从年轻时到到最晚岁月，从无更改。他说自己一生不说谎话，除了1949年前跟国民党特务斗之外。

在他人看来，他傲然站立在这样的时代，需要特别巨大的道德勇气，而对他来说只是出于赤子之心。他大学时代的老师，心理学家陈立到晚年都为自己的处境担忧，而他却坦然地表示，自己只是那个直指皇帝无衣的小孩而已。说真话，是他一生对自己的要求，他也身体力行做到了。他不在乎为此要付出怎样的代价。

做一个人！

他在2000年说，“80岁对我依然是沉重、抑郁的岁月，依然是无尽的苦涩和窒息。”他一生多数岁月都是在逆境中熬过，真正轻松、舒暢的日子并不多。1980年代是他发挥作用最大的10年，可以说是引领风潮的知识分子之一，但也伴随着诸多的曲折。然而，18年来，我每一次见到先生，他总是那样安静、笃定，与他谈论现实和历史，各种人事、思想，他从不急躁，这个时代的浮动不安在他身上似乎没有留下什么痕

■邓聿文

搭紧制度笼子才能关进权力

面。但为什么权力就是关不进笼子？答案就在于，笼子还没有搭建好。

一方面，是搭笼子的“材料”——或如党建专家王长江最近撰文所言，是制度要素——还没有全部准备好，还缺一些质地优良的“材料”；另一方面，是已有的“材料”没有通过一种方式，形成一种笼子的结构，或制度体系。任何形式的腐败，不论具体原因为何，根子都在官员权力过大，不受或少受监督。而官员的权力过大，又在于其权力过于集中，缺乏制衡机制。所以，要分割官员的权力，就必须把原来集中于一个人或机构的权力，分散到不同的人或部门，并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目前，我们最缺乏的就是政务部门。尽管我们也有各种不同的机构，但这些机构的职能、职责等没有从法律上作出明确划分，从而导致在实施中谁的官大，谁的权力就大。对执政党来说，其领导和执政地位主要是就政治而言，是在政治上发挥领导作用，它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各级国家权力机构输送领导和执政人才；二是通过法律，把执政党的执政意志和治国方略变

成国家政策，并监督实施，而不是对具体事务“发号施令”。执政党的这种地位和作用，它同国家权力机构的关系，需要法律严格规范，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各司其职。但现在由于没有类似的法律规划，导致很多领导主导，尤其是一把手，以党领导，党政不分，随意插手和干涉行政事务和政府工作。另一重大法律缺陷，就是政府的决策程序，特别是对一些重大事务、工程、项目等的决策，其程序没有法律规范，也即缺少一部重大决策程序法。由于缺少这样一部法律，一些项目或工程是如何决策的，依据是什么，对相关利益群体是否有损害，人们不得而知，这就很容易造成腐败。

正因为缺乏此类搭笼子的“材料”，我们当前对官员权力的约束，更多还是着眼于依靠行政命令体制，依赖上级权威来约束下级权力。监督主体单一，没有把来自权力机关的纵向监督与一些来自非权力机关的社会监督结合起来，这样导致的结果，就如同人们所讲，“上级监督下级太远，同级监督同级太短，下级监督上级太短，组织监督时间太短，纪委监督有时太

■傅国涌

没写完的民主思想

——初忆许良英先生



■他的志向在大学时代发生了改变，第一学期选课单的“将来志愿”一栏，他写下“当代物理学权威”，第二学期写的是“理论物理学家”，第三学期变成“追求真理”，到最后两个学期则自豪地写上“做一个人！”

■经过长期的阅读、研究和思考，他逐步搞清楚了民主的概念。在当代汉语世界，他对民主理解的深刻和表述的清晰、透彻是少见的。

■他理解的启蒙不是把自己摆在高高在上的位置，而是将自己已放置其中，他耿耿在念的首先是自我启蒙。

经常使用，这在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中绝无仅有。因此，他认为“林昭可以说是20世纪后半期中国大陆知识分子中政治思想境界最高、战斗力最强的思想者和勇士”。林昭的事迹，使熟悉世界科学史的他联想到公元1600年在罗马鲜花广场被烧死的思想家布鲁诺。他给寄来手稿时，还特意复印了一张布鲁诺的画像。

耿直、无畏，对权势说真话诚然难，更难得的是对身边的人、对所有人都是这样的直言不讳，也因此伤了不少知识界朋友的面子，使很多人对他敬而远之。其实在我看来他一直葆有一颗童心，是一座不设防的城，对人是敞开的，对、对事的评判有无顾忌，完全从本心出发，也不是所有的评判都对，但他是严肃的、真诚的，他活得很真实，从年轻时到到最晚岁月，从无更改。他说自己一生不说谎话，除了1949年前跟国民党特务斗之外。

在他人看来，他傲然站立在这样的时代，需要特别巨大的道德勇气，而对他来说只是出于赤子之心。他大学时代的老师，心理学家陈立到晚年都为自己的处境担忧，而他却坦然地表示，自己只是那个直指皇帝无衣的小孩而已。说真话，是他一生对自己的要求，他也身体力行做到了。他不在乎为此要付出怎样的代价。

做一个人！

他在2000年说，“80岁对我依然是沉重、抑郁的岁月，依然是无尽的苦涩和窒息。”他一生多数岁月都是在逆境中熬过，真正轻松、舒暢的日子并不多。1980年代是他发挥作用最大的10年，可以说是引领风潮的知识分子之一，但也伴随着诸多的曲折。然而，18年来，我每一次见到先生，他总是那样安静、笃定，与他谈论现实和历史，各种人事、思想，他从不急躁，这个时代的浮动不安在他身上似乎没有留下什么痕

■邓聿文

搭紧制度笼子才能关进权力

晚。”

所以，反腐的关键，是要建立一套以约束政府（包括执政党）权力，防止和减少权力滥用为目的的机制和制度体系。就当前来说，以下几方面不可缺少：

首先，尽快出台政务组织法，用法律严格规范各级政府的权责和关系，上级不得随意干预和支配下级职能范围内的事情。尤其对于执政党来说，应该按照权力的自身规律去影响和控制政府的运行，而不是随意越过边界去取代它。补上这重要的一环，依法行政才有可能。

其次，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削减政府过大的调节经济社会事务的权力和领域，把大量的社会经济活动交由市场主体和社会组织去完成。政府管得越少，腐败发生的客观几率也就越低。这就需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事实上，上述政务组织法对国家权力机构职权的界定等于为政府确立了边界，政府逾越这个边界而侵入市场领域就是滥用权力。

第三，公开的决策和决策制定要公开透明。公开是最好的防腐剂，向民众开放决

策过程，能够最大程度地减少暗箱操作带来的腐败，同时最大程度地维护公众自身利益，是对政府权力的一种约束。必须明确规定，重大决策和公共政策的制定，要听取公众意见，公众应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和重大决策。

最后，把包括人大、政协和媒体、舆论在内的各类监督落实到法律层面。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它的监督目前宣称在两个方面，一是执政党对干部的输送必须经过人大，即人大对官员的任命权要切实发挥作用；二是预算监督，这一点目前尤其有必要。政协主要是通过协商民主的方式对执政党和政府进行监督。媒体和舆论包括网络反腐，在当前有着特殊的优势，在无处不在的监督下，官员腐败被发现概率就会大大增加。

需要强调的是，这四个方面是一个体系，缺一不可，它们之间没有先后之分，哪方面条件成熟，可先推行。只要加强这四方面的制度体系建设，为权力的行使搭建好一个基本的制度平台和约束框架，就不难治理腐败。

他在1980年代的一些观点，当时有些人不能接受，多少年后人们蓦然发现，他反思得最彻底、告别得最早。我常常想，毕竟他是民国教育出来的，从立本小学到浙江大学，教育赋予他的气质是深水静流、不骄不躁，一步一个脚印，不指望天上掉馅饼，不幻想一步登天。

他曾写过一篇文章《竺可桢的“求是”精神和浙江大学校训》，对他学习、工作、生活过11年的母校深怀感恩之心。“文革”时期他被揪斗，也曾关在浙大。当年在浙大他完成了物理系的学业，王淦昌等教授对他深为赏识，一心要他留校任教，他却决然离开，要投身覆辙民国的革命洪流，主动卷入那个时代的大潮当中，历经磨难，最终回到主流文明的价值当中，民国教育给予了他自我反思的可能性，他对自己早年受的教育记忆犹新。

2000年，我写了《爱因斯坦的影子：许良英的寻路》，他不大同意这个题目，认为自己走的跟爱因斯坦不一样。但他认可我指出他的思想的三个源头：爱因斯坦的思想、台州地域文化、浙大“求是”精神。正是这些，共同构成了他的精神坐标，成全了他一生的人格。

括苍之巔望海尖，地势莫嫌偏。上通永安下灵江，人文地理擅……开学歌咏乐融融，漫烂见天真。迅速地球经数转，得失问寸心。吾侪少年须务本，本立而道生。

这是立本小学的校歌，曾和家乡村的山山水水一同陶冶过他少年的情愫。他对科学的追求，对家国的关切意识，都是在括苍山下形成，《爱因斯坦文集》也是在这里译出来的。张家渡，这个小小的山镇，他们家的“高台门”和“风翻书楼”，正是在那里他最初遇到了爱因斯坦。1938年，他通读了爱因斯坦的第一个中译本《我的世界观》，立志成为爱因斯坦那样的科学家。为此投考浙江工业大学，1939年他如愿以偿，到广西宜山入学，成为胡刚复、王淦昌、束星北这些物理学家的弟子。然而，他的志向在大学时代发生了改变，第一学期选课单的“将来志愿”一栏，他写下“当代物理学权威”，第二学期写的是“理论物理学家”，第三学期变成“追求真理”，到最后两个学期则自豪地写上“做一个人！”

这个做一个人，一个大写的“人”，成为先生毕生的追求，无论革命时代、“反右”时代、启蒙时代。如果要先生在先生身上寻找最宝贵的元素，就是做一个大写的“人”，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无愧于时代，无愧于这块土地的人。

他一生都是这样做的，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都没有动摇。他给予我最大的影响与其说是思想上的，不如说是人格上的。自从1995年那个冬天以来，无论来信还是面谈，他每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地念叨，要有一颗平常心，做一个平常人。所以，他理解的启蒙不是把自己摆在高高在上的位置，而是将自己放置其中，他耿耿在念的首先是自我启蒙；所以，他会穷25年去研究民主的历史与理论；所以，他会在逆境中始终保持一颗纯净的童心；所以，他可以直言不讳地批评各种社会不公，也可以批评许多知识分子。在最糟糕的沉默中，他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他这样做只是从良知出发。他并不赞同高调的理想主义，虽然他一贯地坚持道义立场。

多年以来，每次去北京，先生的家几乎是我去必去之处，我经常不打电话就直接去了，他几乎无例外地在家。他常常要留我吃饭，几乎每次都是吃大馄饨（他牙不好），他亲自烧的，里面加汤圆，王先生说这是他的喜好。

如今，王先生、许先生相继离开。对于我，17年来我一次次进出过的那道门永远关上了，我今生更替，荣华消逝，我的怀念将伴随着我今生的所有时间，愿先生在天之灵安息，愿先生留下的精神遗产成为中国人的持久祝福。

建言献策

“伪城镇化”忧思

■孙维国



如今，城镇化的脚步越来越快，作为一个农民，一个农村城镇化的一线亲历者、见证者，我对当下农村城镇化的一些现象充满忧思。

在城镇化的推进中，农民的权益没有得到充分保障——这种权益不仅指农民的土地权益，更为重要的是农民进城后的发展权益——并由此造成大量没能得到市民待遇的“伪市民”。

如何在城镇化进程中使农民的权益得到保障？在谈这个问题之前，必须要厘清一个根本问题，即农村城镇化是由经济发展自然催生（即“自然城镇化”），还是无视发展规律人为强行推动（即“人为城镇化”）。如果是前者，那么农民的权益就能够最大程度得到保障；反之，如果是后者，农民权益就难免被层层盘剥。

一个农民，如果他已经长期在工厂上班，有稳定的工资收入和厂里为他缴纳的基本福利保障，那么此时他身份虽是农民，也有土地，但土地于他成了一种副业，他实际上已是一名产业工人。他的这种身份转换显然是由经济发展自然催生，而非人为强行推动。经济发展了，工厂、商场自然增多，农民就业就有了支撑，此时如果他的土地被政府征用，他就随之被城镇化。这种城镇化不仅自然而然，也能使这位农民土地被征后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当前农村城镇化的一个最大问题，恰恰就是农民进城后生活有保障。

而“人为城镇化”，常常是一种典型的“伪城镇化”，是借发展经济之名，行掠夺土地利益之实。以为将农民的地征掉，一次性补偿一笔征地款，再将农民赶上楼，就是城镇化了。至于农民“上楼”后有没有稳定工作获取经济来源以支撑生活，有没有基本的生活保障以解除后顾之忧，则不管不问。

于是，一个难以避免的结果就出现了。这些土地被征进城的农民，你说他是市民，他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和福利保障；你说他是农民，他没有土地。人是到城里了，也住在楼上了，但生活反而比以前更差。由于这种城镇化并非经济发展自然催生，有限的补偿款只能短期保障农民进城后的基本生活，却无法提供长期的生活支撑。

外观这种城镇化，高楼林立，新城拔地而起，不断攀升的地方GDP，官员闪亮的政绩。与此对应，缺乏后续生活保障的农民越来越多，民怨越积越大。这不是真正的城镇化，虚有城镇化之表，没有城镇化之实。

这样的城镇化，出问题是很早的，最终损害的是农民和国家的利益，为此买单的是整个社会。有人说这是城镇化的错，其实不是，城镇化本身没有错，错在这种城镇化的路径是无视发展规律人为推动。是一些人的急功近利，鼠目寸光，利欲熏心，造成了“伪城镇化”，产生了大量“伪市民”。

令人忧虑的是，“伪城镇化”如今仍然在一些地方进行得如火如荼。这些地方的官员不知道这样的城镇化会出问题吗？不，他们可能比谁都清楚背后的重重隐忧，可这样做能以最快的速度提升GDP和政绩，先捞取政绩，再捉襟见肘，出问题也与自己无关。

这是一个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和深刻反思的问题，也是一个农村城镇化的一线亲历者、见证者深切的忧思和呼吁。农村城镇化难免会出现问题，但如果采取了错误的路径，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